

翻译研究

创造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翻译家 李安宅的译者行为研究

郭晓晨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李安宅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家,在其学术生涯前期译介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本文结合李安宅的译作及相关学术著述,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指导,从翻译内、翻译外两个层面对其译者行为进行分析。翻译内层面分析译者的务实策略,翻译外层面主要探析译者的翻译目的与翻译选材。本文发现,在翻译外层面,李安宅的“学者型译者”身份及其对科学知识的认识,对他的翻译目的和翻译选材产生重要影响;在翻译内层面,译者偏向务实性翻译策略,力求对科学知识的有效传播。本研究不仅拓宽了李安宅研究的维度,也深化了社会科学领域翻译家研究的“宽度”和“厚度”。

关键词:李安宅;译者行为;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2-0155-11

0 引言

李安宅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和人类学家,学术旨趣广阔,著译宏富。目前关于李安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人学术史及学术思想、藏学研究和边疆学研究,相对忽略了其社会科学翻译的贡献。事实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李安宅的学术生涯最活跃的时期,他译介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学说、思想、理论与方法,包括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Frazer)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英国语义学家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美国人类学和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等人的著作(见表1),其中不少译著做出开创性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和意义。目前已有学者述及李安宅的翻译活动,但只是在其研究主线上稍有旁及,未见系统讨论。鉴于此,本文拟借鉴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面考察李安宅的译者行为,立体性地呈现被“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标签遮蔽的“翻译家李安宅”。

收稿日期:2025-08-10

作者简介:郭晓晨,男,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一级翻译,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引用格式:郭晓晨. 创造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翻译家李安宅的译者行为研究[J]. 外国语文,2026(2):155-165.

“译者行为批评”以译者意志及其行为为切入口(周领顺,2020: 52),以“翻译内”和“翻译外”构成指导分析问题的纲领,形成一种二元性的分析视野,但两者是一对彼此互动的关系(周领顺,2024: 107)。“翻译内”主要关注从文本到文本的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应对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周领顺,2020: 52)。“翻译内”将译者看作语言性凸显的语言人,属于译者的语言性行为。“翻译外”指的是翻译外部因素及其研究,关涉翻译活动之外的超出翻译本身的因素(周领顺,2018: 104),比如政治环境、历史条件、文化场域等社会因素及译者素养、翻译立场、翻译目的等主观性因素。“翻译外”将译者看作社会性凸显的社会人,属于译者的社会化行为。以上两个维度的有机结合可以更全面、客观和科学地解释译者的翻译活动与翻译过程(周领顺,2024: 107)。本文以李安宅的译作及其副文本、学术著述和学界评论等文本为主要分析对象,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从翻译内、外两个层面尝试剖析李安宅的社会科学翻译家维度,尤其对其翻译目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展开描写性研究。

表 1 李安宅社会科学译著概览

翻译方式	译作	出版时间	出版社	原作	作者
全译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1936	商务印书馆	<i>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 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i>	马林诺夫斯基
	两性社会学	1937	商务印书馆	<i>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i>	马林诺夫斯基
节译	交感巫术的心理学	1931	商务印书馆	<i>The Golden Bough</i>	弗雷泽
	知识社会学	1944	中华书局	<i>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i>	曼海姆
编译	意义学	1934	商务印书馆	主要根据 <i>The Meaning of Meaning</i>	瑞恰慈、奥格登
	巫术与语言	1936	商务印书馆	该书最后一节译自 <i>Language</i>	萨丕尔

1 翻译外：“学者型译者”身份与翻译生产

翻译外的研究凸显了译者的“社会人”角色,强调翻译行为的社会属性。从这一层面,我们看到社会环境、译者身份、学术思想等都对李安宅的翻译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其“学者型译者”的身份以及“学术救国”的理想信念,为他的译介活动提供了直接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李安宅学术生涯的前期处于社会剧变、知识更迭和学术转型的变动时代,知识界积极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试图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李安宅积极投身译介浪潮,特别关心如何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知识建设”。他大力译介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说与理论,尝试构建自己的“知识方案”,以“改进中国社会、服务于国

家建设”(岳永逸,2021a:26)。李氏的翻译活动始终围绕着中国需要什么知识、如何生产和传播科学知识等思考,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现代化,尤其是本土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具有积极影响。

1.1“学者型译者”的双重身份

李安宅身兼社会科学学者和译者,这一“学者型译者”身份与他的翻译生产密切相关,一是他的知识结构对翻译选材有一定影响,二是他的学术研究与翻译并行,译、研互促。李安宅的翻译实践呈现明显的“杂学”特征(岳永逸,2021b:29),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这与他的学术网络不无关系。他早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作为“燕京学派”的一员,对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理念及方法十分青睐,翻译了马氏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1936)与《两性社会学》(1937)。在燕大期间,他与哲学系教授张东荪来往密切,节译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1938),与张氏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相呼应。该译文是曼海姆主要著作的首个汉译本(张耀南,2004:28)。李氏还曾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求学,深受萨丕尔教益,其编译的《巫术与语言》(1936)一书中的《语言底综合观》就译自萨氏《语言》(Language)一文,该书是第一本译介萨氏语言学理论的著作(贾洪伟,2010:85)。

李安宅对巫术、宗教与语言的研究兴趣与翻译实践呈现明显的互动关系。他的《交感巫术的心理学》(1931)译自弗雷泽《金枝》(*The Golden Bough*,1922)的第三章《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该书是人类学巨著《金枝》最早的中译本,有学者还将其列入“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邹振环,1996:364-367)。1929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李氏曾留校担任燕大国学研究所编译员,在此期间与来华讲学的剑桥大学教授瑞恰慈交往甚密,协助瑞氏研究孟子,帮其写就《孟子论心》(*Mencius on the Mind*,1932)一书。李安宅对瑞氏理论体悟较深,在其影响下编译了《意义学》(1934)一书,该书上下两编分别介绍了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儿童语言和思想的研究以及瑞恰慈和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研究“意义(meaning)”的方法和案例。该书是国人研究瑞恰慈理论的第一本专著(吴虹飞,2003:128),是西方语义学传入现代中国且“反响最大”的路径(李葆嘉等,2018),也“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唯一的一本讨论符号及其意义的著作”(赵毅衡,2020:1)。

1.2 翻译目的

李安宅的译者行为受到现实关怀和学术建构的驱动,两者均指向“建设科学”的根本目的。作为关注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李安宅保持着对社会问题足够的敏感与浓厚的兴趣,撰文探讨两性与婚姻、家庭组织、社会变革、国家建设等议题。他的“学者型译者”身份,促使其将翻译实践转化为知识生产的中介,通过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与概念

工具,试图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为中国的社会改良提供借鉴。例如,《两性社会学》的翻译缘由即是李氏注意到中国传统父权家庭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认为有必要将此书介绍给中文读者,以使读者“能在真理方面投些侧光”(李安宅,1937:译者序,5)。

从学术建构的维度看,李安宅积极建构适用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翻译行为彰显出理论自觉与方法论的创新。他注意到学术界使用的概念含混不清,各说各话,学术论争沦为“字眼之争”,难以形成科学、清晰的思想,译介瑞恰慈关于语言、意义与思想的理论及方法,目的就是给中国学术界添上“新眼光”,养成“透视力”,“将西洋一点科学基础的萌芽,播种到中国的领域”(李安宅,1934:自序,1)。李氏大力译介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学说,将其应用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中,并在翻译和理解马氏理论的过程中,加以调适和改造,以此适应中国的思想传统和文明特性。这也符合他曾说到的观点:西洋的主义、政策与制度有其自身的历史条件与生成境地,并非随意治疗中国社会的万灵丹,而应因时因地而制宜,即加以创作,解决中国的“切肤问题”(李安宅,1938:244)。

李氏曾坦言,自己一方面“有建设科学的野心”,一方面又关注“活的人生”,“要在活的人生里面找出理论的指导线索”(李安宅,1938:自序,7)。他的社会科学理论译介就是这一主张的写照:翻译不仅是其学术研究的操演,即建设科学理论的尝试,更带有明显的现实关怀及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探索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可能。

1.3 翻译选材

李安宅的学术主张及其对科学知识的认识是影响其翻译选材的主要因素。

1.3.1 实地研究与知识生产

李氏认为:“产生正确知识的唯一方法,即在实地研究”,“由实地研究而得的知,整理成系统就是科学。”(李安宅,1938:自序,10)他不断强调实地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实地研究才是产生真知的根本途径,才能实现开物成务的创作。李安宅对马林诺夫斯基著作的翻译契合了他所理解的科学的研究精神与方法以及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发展走向。在李氏看来,用文化人类学补社会学之不足是关乎国情的学术,是转译为学的方向(李安宅,1936a:译者序,3)。马林诺夫斯基是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开山鼻祖,致力于实地研究,采用文化功能分析的方法考察整个社会现象。李安宅认为,马氏的研究“有骨有肉”,最能代表人类学“最先锋的思想与成绩”(李安宅,1936a:译者序,8),“著者在西洋的学术界已是大声疾呼,在素来不重实学、不重实地经验的中国,更有加紧提倡的必要”(李安宅,1936a:译者序,7),选译其作品意欲说明“这类著作对于国内学术界的可能影响”(李安宅,1936a:译者序,1)。李安宅译介马氏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极大地促进了马氏理论和文化人

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1.3.2 语言自觉与建立科学

李安宅十分重视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具有承载思想的功能,既能造成思想的障碍,亦能把握意义的逻辑、建立科学的基础,改变思想与社会现实。在他看来,意义学或意义逻辑是真正自觉的科学所必需的基础(李安宅,1934:自序,2)。要先有“字的意思”或“语言意识”的自觉,才会有真正自觉的科学。意义学助于延长智识年龄,维持思想健康(李安宅,1934:绪论,5)。李氏编译《意义学》一书,就是为了阐明语言、思想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瑞恰慈在为该书所写的《弁言》中提到,中国需要西洋的科学,因为科学是一种思想的途径,能将事物与语言加以思考。语言、思想和事物三者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科学的始基(吕嘉慈,1934:吕嘉慈教授弁言译文,6)。冯友兰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对于这种语言思想的毛病,吕嘉慈先生等所倡导的‘意义学’是有用的药。李安宅先生介绍这一派学问到中国,我想是很有益的。”(冯友兰,1934:冯友兰教授序,2)西方哲学史家全增嘏(1934:383)盛赞该书为“近年来介绍西学学术的最有价值的一本书籍”。李氏对“语言意识”的呼吁具有重要的启蒙价值,时至今日,他所强调的澄清学术语言的理想仍具有现实意义(唐晓丹,2008:122)。

李安宅在《知识社会学·译者弁言》中似有回顾其翻译历程的意味,表现出“自成体系”的思考脉络。他认为“思想”至少有三个领域:一是思想工具,即符号或语言文字;二是思想规律,即逻辑;三是产生、接受以及运用思想的背景,即关于思想的社会学或知识社会学。李氏认为,《巫术与语言》《意义学》和《两性社会学》分别介绍了以上三个领域,而《知识社会学》正是关注思想产生和接受的背景,也属于第三个思想领域(李安宅,1946:译者弁言,2)。李安宅(1946:译者弁言,3)认为,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研究的新角度,代表一种新的观点与方法,“我国社会史,社会学思想史,不是都需要努力建设吗?知识社会学的观点,便是我们的指南针”。

1.4 译者的翻译观

李安宅(1946:译者弁言,2)在翻译实践与学术研究中逐渐体悟到翻译的本质,认为“翻译工作,是用适当符号说明原书所指(referent),不是直接对换符号(譬如用汉文换英文)”。在他看来,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承载意义,但只能通过其所指的事物体现出来。翻译是在语言符号转换的过程中,不关注语言符号的形式,而是“译之有物”,在翻译中实现语言符号的“所指”对等,此曰“名物达指”。在翻译中,李安宅(1938:68)注重原文意义的再现,遵循“名物达指”的“求真”观,认为译者需具有语言符号与所指实物、实况和实在关系的自觉。他对词义的选择十分考究、谨慎,运用创译、改译等策略,试图抓住“所指”。在他看来,同一符号因为上下文的不同,所指则不同(李安宅,1938:3)。

在《知识社会学》中,李氏根据上下文语境,认为“ideology”一词有时指广义(“意态”),有时指狭义(“利图”),他不强求统一译名,“不避换用字眼,以便辗转其词,吐露出著者底原意”(李安宅,1938:3)。又如《两性社会学》中“interest”有“兴趣”或“利益”之义,有时则两者兼备,李氏将之译为“趣益”。除了对文本中词义的选择外,李安宅对译著书名的翻译也显示出“名物达指”的“求真”观。他基于对《两性社会学》一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解读,认为若将原书名 *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 直译为《蛮野社会里的性及抑室》甚不妥当,遂采取变通的译法,译为《两性社会学》,认为这一译名更为准确,一来凸出了原著的研究方法,即关于性的社会学比较研究,二来出于对读者理解的考虑,以免“望文生义”(李安宅,1937:译者序,5)。

2 翻译内:李安宅的“务实”翻译策略

“翻译内”研究包括微观的词汇、句法、语篇及其联想意义、韵律、意象等从内容到形式的再现以及翻译策略、翻译标准、翻译单位等的具体运用(周领顺,2018:104)。“翻译内”凸出译者的语言性行为。“译者行为批评”基于译者的语言性行为和社会性非译行为,延伸出“求真—务实”的连续统评价模式。“求真”是指译者为实现务实目标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真相的行为,“务实”是指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的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周领顺,2020:53)。作为译者的李安宅,他的翻译行为表现出显著的务实策略。他十分注重译介效果,关心读者对于译介知识的接受,也就是译介的知识如何落地,如何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与探讨。他充分发挥务实于读者的精神,从译作的组织形式(例如添加附录、小标题等),到译文中的译者注、译者按语等诠释性文本,再到中西比附的编译策略,可以看出李氏采取向读者和社会靠近的“务实翻译”,其鲜明的“务实”态度与方法不仅注重译介知识的整体观和全面性,也增强了译介知识的传播力和引导力。

2.1 “知识整体观”的翻译方案

李安宅的社会科学翻译与研究相辅相成,特别是对西方人类学、语言学等学说的探索,使其翻译行为具有相关知识体系的支撑。撰写序言、编译方式、增添标题和附录(论文、词表索引、地图等)都体现出他的整体思维与系统考量的翻译特点,努力给读者呈现一个全面性的“知识体验”,帮助读者从整体上把握著者与原文的思想内涵与理论价值。

李安宅几乎每本译作都会用一定的篇幅撰写序言,介绍著者生平、学术思想、学术动态、翻译动机和翻译过程等信息,为读者进入译本奠定了基础。他还在译者序言中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例如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的《译者序》中,他着重介绍了人类学的历史、学科分类与学科性质,讨论人类学对中国的意义与价值以及人类学在中国的未来趋向;

又如在《知识社会学》的《译者弁言》中,李氏介绍了知识社会学的内涵,认为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是我国学术建设的“指南针”。这些文字旨在引起读者的思考与行动。

再者,《巫术与语言》的结构编排体现了李安宅将巫术现象与语言学理论结合的思路。该书由三篇独立论文集成,先是其撰写的《巫术底分析》(介绍巫术心理)和《语言底魔力》(介绍语言意义的分析),然后翻译萨丕尔《语言底综合观》一文进入语言的“全体”,“这一点点的介绍……都是现阶段这类知识底最高峰”(李安宅,1936b:编者序,5)。李氏还在译文中根据内容主旨,自行添加小标题,将文章分为九节,诸如《语言底一般属性》《语言底心理属性》《语言底起源》《语言底功能》等,以此“醒目”,有助于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此外,他还特地编写附录《语言分布统计概要》,“以免读者不知所指”。该书是我国第一本从语言学理论解释巫术作为社会语言现象的著作(贾洪伟,2010:85)。

在《意义学》的书后,李安宅翻译了瑞恰慈的《〈意义底意义〉底意义》和翟孟生(R. D. Jameson)的《以中国为例评〈孟子论心〉》作为附录。瑞氏的文章概述了《意义底意义》一书的缘起与思考过程以及“意义学”的研究方向。翟氏的文章是对瑞氏《孟子论心》一书的评论,该文认为,瑞氏运用意义学理论对中西思想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是一项有益的尝试,为中西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与新思路。这两篇附录一方面体现了“意义学”的历史源流与现实意义,一方面展演了这门学问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关系,使读者可以对“意义学”有更全面、深刻的理解,激发进一步探索的兴趣。在翻译完《两性社会学》后,李氏在书后附录了卡尔弗顿(V. F. Calverton)的《近代人类学与阶级心理》和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的《马林诺夫斯基对于一种解说的考验——该项假说即以对于单独一种文明所有的先入之见为根据者》两篇译文,“以便读者知道现在研究人类学的概况”(李安宅,1937:译者序,6)以及马林诺夫斯基对人类学研究的贡献。《知识社会学》的书末附以张东荪的《思想言语与文化》一文,“盖因张先生底看法要与孟汉(即曼海姆——笔者注)底体系比较参证,更为有益”(李安宅,1946:译者弁言,4)。李安宅以其社会科学家的身份在翻译时融会相关知识与研究,不拘原文的形式与内容,添加相关知识文本,使译本的建构方式凸显了译者的学术考量与知识布局。

2.2 “现身说法”的“注疏式”策略

李安宅的“学者—译者”双重身份影响了他对原文的文本解读以及译文的呈现方式。学者身份赋予其从专业的角度理解与阐释原文的能力。他经常在译文中添加译注、按语等副文本,对原文进行加工与再造,显示了译者的深度“在场”与绝对“显身”。以《两性社会学》的翻译为例,该书虽是“一句不少地介绍过来”,但译者所增添的“译者注”成为其解释、补充和评论原文的文本空间。马林诺夫斯基在该书第一编第一章《问题发凡》(The Problem)中提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需要增加社会学的研究,这便引起了对家庭组

织如何影响人类心理影响的关注。马氏在文中介绍了几种家庭组织变迁的学说,认为这些大都是“假设多事实少的混杂构想”。李氏则在译者注中评论这几种学说稍感“杂乱无章”,他认为马氏所依据的或许是恩格斯一派的学说,但却混合了数种学说,为“醒眉目”,遂介绍了恩氏一派所说的四种变迁阶段,即“血族群婚家庭”(the consanguine family)、“合伙婚家庭”(punaluan family)、“对偶婚家庭”(the pairing family)和“单婚家庭”(monogamous family)。又如,马氏在第三编《文化的元始原因》(The Primordial Cause of Culture)一章中提到,弗洛伊德关于图腾制度、禁忌、族外婚和祭祀起源的学说,在人类学精神分析的著作中具有重要意义。李安宅在译者注中提到图腾制是一种社会制度与宗教制度,他先介绍了“图腾”一词的来源,然后介绍了哈特兰德(Edwin Sidney Hartland)在《宗教伦理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中“图腾制度”(totemism)词条里所说的图腾制社会具有的五种特征。此外,李氏还在“于中国问题有相发明的地方加以按语和译注,以便读者发生比较的趣味”(李安宅,1937:译者序,5)。例如,原作在《婴儿期的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一章论述了父亲对婴幼儿时期的子女情感不一的表现与成因,认为父亲将女儿看成自己女性的化身,对女儿的情感更温柔。李安宅在译注中则以中国情形为例,认为富有阶级对女儿的温柔情感,一是炫耀自己的能力和财富;二是不把女儿当自家人,多少有些客气;三是男女有别,对女儿有些回避。贫苦阶级则把女儿当成“赔钱货”而多加亏待。本土案例的嵌入为读者的理解提供了便利。

李安宅(1936a: 76)在翻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的第五章《巫术与信力》(The Art of Magic and the Power of Faith)时,认为“本章极有贡献处极多,但亦有未广处”,“似有随时附加按语的必要”。译者通过《按语》与著者对话、论辩,商榷观点。例如,原著在介绍《巫术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Magic)时,认为巫术是为人而创的(made for man),总是为人类所有。李氏撰写了长达四页的《译者按》与这一观点辩驳。他以中国和美洲地区流传的故事为例,说明人类之外的自然界也可以独立保有、执行和传授巫术,马氏的这种观点反映了“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以及“本族文化至上论”(ethno-centrism),进而又批判了基督教义与帝国主义的弊病(李安宅,1936a: 85-87)。又如,关于巫术信仰与实际经验的关系,原著认为巫术信仰和行为源于实际经验的启示,李氏在译者按语中批评道,这里显然承认巫术可以新创,与作者之前“巫术无起源”一说相悖,他认为作者在逻辑上犯了“范畴错置”的毛病,不过前者就巫术的社会功能而言,赋予巫术一个功能起源论,后者从心理信仰出发,是为了相信巫术的“信力”(power of faith),两者并不冲突,但要弄清范畴(李安宅,1936a: 101-102)。

可以看出,李安宅在翻译时充分发挥了学者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这种“注疏”式的翻译方法强化了译本的学术性与知识性,将译本转化为学术对话的场域。通过“副文本介入”

的策略,既提升了译著的学术深度,同时也丰富了读者的阅读视域,促进他们对原文知识的理解与思考。

2.3 “中西比附”的编译策略

李安宅(1934:自序,1)在其编译的《意义学·自序》中提到:“这本东西,直接间接都是吕嘉慈教授(即瑞恰慈——笔者注)的惠与。”我们注意到,李氏在引介瑞氏理论的核心观点和重要论述的同时,不仅融入自己的见解,还以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进行比附与阐释,也就是“将一部现成材料加以另一种组织,即所谓编译的工夫。”(李安宅,1934:自序,1)全增嘏(1934:383)认为,这种编制方法既不像翻译作品佶屈聱牙,而且所引之处也都标明出来,“介绍西洋学术的人都学李君这种办法,一班读者得益定非浅鲜”。

李安宅在该书下编介绍意义学的研究方法,并以“意义”和“信仰”等字词的语义内涵为例进行分析,展示意义学研究的步骤。他介绍了瑞恰慈和奥格登从不同角度辨析“意义”一词的16种“意义”,利用瑞、奥二氏的理论间架,不时以中国文学和文化等方面的例证加以阐释。例如,“意义”就是语言文字本身的“内在德能”(intrinsic property),根据原始巫术的思维,语言文字本身就具有“意义”。针对这一点,李安宅借用李商隐的诗句,“南浦老鱼腥古涎,真珠密字芙蓉篇”,“密字”就是拥有某种内在力量的文字。《吕氏春秋》中所说的“有能增损一字者,立予千金”,也是相信一个字的本身就有意义。又如,“意义”是指任何事物所唤起的情感(emotion aroused by anything),李氏引用孟子所言“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认为这里的“理义”和“刍豢”的“意义”就是“悦我”,又引庐江小吏诗“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这里“此事非奇”的“意义”便是“违情义”。再如,“意义”是某种刺激的记忆反应(the mnemic effects of a stimulus),因而获得某种联想(associations acquired)。杜甫的“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其中“故意”即是“十觞”的意义,“十觞”这种刺激物引起关于以往情谊的联想。杨衡的“不堪今日望乡意,强插茱萸随众人”也是这种情况。李安宅凭借自身对中国典籍和古代文化的研究,注重西方学理与本土文化的结合,将西方语义分析体系与中国文化资源互释。这种融摄中西、比附阐释西方学理的策略,可以消解外来理论的陌生感和异质性,更好地被读者接受和吸收(唐晓丹,2007:155),也有助于瑞氏理论的理解与传播,为早期中国开展语义学、意义学研究提供助力。

综上所述,李安宅的“务实”性翻译策略以知识阐释为中心,从知识组织、知识解读、知识融合等方面,试图在翻译中“创造科学知识”,构建整体性的知识体认,导引读者的思考方向,关心译介知识于本土的落地与成长。

3 结语

学术界一般冠以李安宅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头衔,却较少关注其翻译家的一面。作

为“学者型译者”,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学术救国”为理想,致力于引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寻求科学知识的建设,推动本国社会科学的构建与发展。他的译介活动不仅为其学术研究提供了问题意识与理论资源,还生产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译本,尤其是对马林诺夫斯基学说和方法论的译介,成为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经典,在学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译者为中心,考察译者与各种因素互动关系的翻译批评理论(刘立,2023:139)。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身为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引进者和传播者,李安宅的知识背景、学术主张和学者素养与他的翻译实践互促互彰,也直接影响了其翻译动机、翻译选材及翻译策略,这也证明了“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面的相互关系。李安宅始终围绕着“创造科学知识”的决心,采取务实性的翻译策略,表现出知识引进、吸收与再生产的特点。本文不仅在于呈现近代社会科学翻译史中的李安宅,更重于分析他的译者行为,丰富了“李安宅研究”的维度,拓展了翻译家研究的“宽度”,也深化了社会科学领域翻译家研究的“厚度”(方梦之,2021)。

参考文献:

- Malinowski, Bronislaw.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C] // Joseph Needham. *Science Religion and Realit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5.
- 方梦之. 2021. 翻译家研究的“宽度”和“厚度”[J]. 英语研究(1): 11-20.
- 冯友兰. 1934. 冯友兰教授序[M]//李安宅. 意义学.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贾洪伟. 2010. 《巫术与语言》的译介考察[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7): 83-85.
- 李安宅. 语言底魔力[J]. 社会问题, 1931(4): 1-10.
- 李安宅. 意义学[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 李安宅. 1936a. 译者序[M]//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李安宅,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
- 李安宅. 1936b. 编者序[M]//李安宅. 巫术与语言.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6.
- 李安宅. 1937. 译者序[M]//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两性社会学. 李安宅,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8.
- 李安宅. 1938. 社会学论集: 一种人生观[M]. 北京: 燕京大学出版社.
- 李安宅. 1946. 译者弁言[M]//卡尔·曼海姆. 知识社会学. 李安宅,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4.
- 李葆嘉, 刘慧. 2018. 西方语义学传入中国的路径[J]. 汉语学报(1): 2-11+95.
- 刘立. 2023. 民国女性翻译家张近芬的译者行为研究[J]. 外国语文(4): 138-148.
- 吕嘉慈. 1934. 吕嘉慈教授弁言译文[M]//李安宅. 意义学. 李安宅,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全增嘏. 1934. 李安宅之《意义学》[J]. 人言周刊(19): 382-383.
- 唐晓丹. 2007. “意义学”与中国现代学术语言观的自觉[J]. 学术论坛(1): 154-157+162.
- 唐晓丹. 2008. 《意义学》的中国意义[J]. 中国图书评论(10): 117-122.
- 吴虹飞. 2003. 瑞恰慈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G]//徐葆耕. 瑞恰慈: 科学与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26-133.
- 岳永逸. 2021a. 实地厚生: 李安宅的文化社会学[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19-27.

- 岳永逸. 2021b. 魔障与通胀:李安宅的意义学[J]. 学海(2):21-30.
- 张耀南. 2004. 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知识社会学”[J]. 哲学研究(7):28-33+95.
- 赵毅衡. 2020. 李安宅与中国最早的符号学著作《意义学》[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1-5.
- 周领顺. 2018. 翻译家方重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J]. 外国语文(4): 103-109.
- 周领顺. 2020. 译者行为批评关键词集释——代专栏导言[J]. 语言教育(1): 51-53+59.
- 周领顺. 2024. 译者行为批评中的“翻译外”研究——兼作翻译内外分析框架与“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的比较[J]. 中国外语(5):106-112.
- 邹振环. 1996.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Creat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A Study of Li Anzhai's Translations of Social Sci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GUO Xiaochen

Abstract: Li Anzhai (1900-1985), a renowned Chinese sociologist and anthropologist, translated numerous Western social science works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his academic career. This paper employs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and uses the intra-and extra-transla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Li's translation behavior based on his translations and scholarly writings. The extra-translation analyzes the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 translator's behavior and the intra-translation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is article finds Li's scholar-translator dual identity, especially his percep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his selection of works to be translated and translation motivations. And his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rategies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translated knowledge. This research not only expands the academic dimensions of Li Anzhai but also enriches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ranslator research.

Key words: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Li Anzhai; scientific knowledge; translations of social sciences

责任编辑:陈宁